

袁长江 著

先秦 两汉

诗经研究论稿

學苑出版社



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

袁长江 著

学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/袁长江著. - 北京:学苑出版社,
1999.8

(学苑文丛)

ISBN 7-80060-042-4

I. 先… II. 袁… III. ①诗经-文学研究-中国-先秦时
代②诗经-文学研究-中国-汉代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3905 号

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

高碑店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32 开本 12 印张 180 千字

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3000 册

定价:23.00 元

序

袁长江同志早年毕业于我校中文系,今年又作为中国古代文学访问学者来到我系。在一年的访学过程中,长江同志刻苦、勤奋,完成了有关《诗经》研究的论文十三篇。这些论文的内容比较广泛,涉及到《诗经》最早的评论者为谁?风、雅、颂的由来及衍变,赋诗断章的意义,孔子、孟子、荀子对《诗经》的评论,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记述《诗经》的作用,《毛诗序》的本义,汉代《诗经》的政治作用等。总之,对自孔子以前至汉代关于《诗经》的评论、研究作了深入的探讨,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汉以前的一部《诗经》学史。

作者博览群书,发现问题,便慎思明辨,剖析毫芒,作出判断,颇多独到的见解。又作者极重视穷源溯流,诸所论述无征不信,唯史实是求,学风严谨。洋洋十余万言,足见其惨淡经营之苦心,以创造性的劳动,对《诗经》学研究做出可喜的贡献!

长江同志这部著作,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书,是一部好书,我阅读之后很受教益,借此机会写上几句,向读者和同行们推荐。

聂石樵写于北师大宿舍之流光幻影楼

1995 年仲夏

前 言

我对《诗经》的研究,是从讲授先秦文学开始的。当时资料很缺乏,虽然三十多年前读大学时曾把《诗经》中大部分篇章背诵下来,但到这时有些诗不看注释,弄明白诗义都困难了。于是下决心收集有关资料,把能找到和买到的《诗经》注本的注释抄录在活页纸上,后来又把有关评论文章也摘录下来。几年来,竟辑得了四大本,有几百万字,俨然像一个集注与集说的本子。在此情况下产生了对《诗经》系统研究的想法。于是又着手整理材料,先是把先秦著作中涉及到《诗经》的有关章节都节录下来,其后扩大到两汉,并时常注意收集古今对《诗经》研究的著作和文章。其间,《左传》中记述的春秋赋诗用诗盛况,使我不禁掩卷沉思:何以在春秋时代会出现这样的诗经文化现象?这种诗经热的基础是什么?由此我推断当时必有一个统一的《诗经》本子,并且这些赋诗用诗之人曾经过专门培训。通过对《三礼》记述的周代官制及有关资料的分析,使我确信周代有两类性质不同的学校,一是培训乐工的职业技术学校,一是培养国子——贵族子弟的学校。

儒家与《诗经》有不解之缘,孔子、孟子和荀子都对《诗经》发表过评论。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,他们的评论和对《诗经》的态度也不相同。考察比较三位大师的说诗,可以把握《诗经》在先秦地位的变化。

没有一部作品问世像《诗经》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效应,还在诗歌创作和诗集编订时期,社会上就掀起了诗经热。孔子对他的儿子孔鲤所说的“不学诗,无以言”并非恫赫之语,不熟悉《诗经》很难进入上层社会。《诗经》最初本是以声为用的,所谓采之朝野,用之庙堂。但到了春秋时代被断章取义地运用到各个方面,尽可能地发挥着其社会作用。孔子的“兴观群怨”说并非虚言。今人往往因研究的角度不同而分为多学科,从这个意义上讲,《诗经》在走上社会之初就出现了多种学科。乐工的歌唱演奏且不论,单是国子学的“乐语”,就分“兴、道、讽、诵、言、语”六种。孔子谈的除四种作用外,还提到了伦理学、博物学。汉以后研究的角度就更广了。

汉代是经学形成并盛行的时代,汉人认为凡可用以资政的前代文献,不论是文学作品,还是史学或哲学著作,都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去解说。特别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“废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建议,儒家的地位空前提高,大有向宗教化方面发展的趋势,而被尊为儒家经典的著作,俨然如圣经。《诗经》经学就是在这种类似宗教的氛围中形成的。汉代四家传诗,虽侧重点不同,但都离不开这种经学思想,现在三家诗已亡,只剩《毛诗》,但从后人辑得的三家诗说看,虽和《毛诗》有出入,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,都是从教化的角度解说诗旨。

《毛诗大序》是一篇典型的儒家诗论,它的形成渊源有自,“自谓”的传自子夏当然是荒诞的,但与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。然而两千年来对《毛诗序》的种种误解和非难,使每个研究者不得不涉足其间,所以廓清《毛诗序》的真正意义,不论在《诗经》研究上,还是在文艺理论上都有其重要意义。

对《诗经》的研究,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。春秋时期的不用说,汉代的经学研究,宋明的理学研究,清代的汉学研究和考据学,虽同属儒家思想范畴的研究,却各具特色。“五四”以后,虽然有些学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去研究,但又不能完全排除儒家思想的影响。近期有些人搬来西方的理论套在《诗经》研究上,而又往往忽略了《诗经》产生的具体人文环境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特色。诗经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,同时又是一门新的学科。笔者不揣浅陋,意在抛砖引玉,以使诗经学研究焕发出新的光彩。

袁长江

1995年夏

目 录

序	(1)
---------	-------

前言	(3)
----------	-------

壹 诗经发生学论

一 论《诗经》的编订与最初研究	(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二 论赋诗断章	(19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贰 儒家诗经学论

一 孔子与《诗》	(59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二 孟子与《诗》	(104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三 荀子与《诗》	(123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四 孔子、孟子、荀子说《诗》之比较	(154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五 《荀子诗说》平议	(169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叁 六诗六义论

一 说风、雅、颂	(215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二 “兴”的原始意义及兴意的引申和转换	(233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肆 汉代诗经学论

一	论《毛诗序》·····	(275)
二	说《韩诗外传》·····	(314)
三	汉代《诗经》的经学研究·····	(330)
四	谈汉人的比兴观念·····	(356)
	后记·····	(368)

壹 诗经发生学论

一 论《诗经》的编订与最初研究^①

(一)

《尚书·尧典》中“诗言志，歌永言”六字已成为人们讨论、评价《诗经》的经典性文字，似乎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都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的。其实不然。“诗言志，歌永言”是对以前诗歌创作的总结，不是对诗歌创作提出的要求。《诗经》时代的诗歌创作也不应看作是按这一要求进行的，而只是继承了这一传统。有周一代是诗歌创作空前繁荣的时期，从《诗经》集子的编订到引诗用诗之盛，可以看出，春秋战国时代，《诗经》已经几乎深入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而不只是“言志”、“永言”之类的简单精神方式。我们不妨用统计法看

^① 这是一篇推论性文章，曾作为首届《诗经》国际研讨会交流论文，收入本书时做了修改，题目也稍有变动。

看先秦赋诗、引诗、论诗的实际情况。

1.《左传》记宴会赋诗 23 次,共赋诗 64 首,歌诗一次^①;非宴会赋诗 8 次,赋诗 9 首;记述孔子引诗评论时事和时人 5 次,引诗 6 首;作者引诗评论时事和时人 28 次,引诗 36 首;记述作诗 4 首;直述作者作诗意图的 9 首;其它引诗 98 首。还不包括逸诗。

2.《论语》引诗 7 次,评诗 4 次,从音乐角度说诗 5 次。也不包括逸诗。

3.《孟子》引诗 30 首,评诗 5 次。

4.《荀子》引诗 76 首,评诗 11 次。也不包括逸诗。

从上述统计,我们看出当时用诗的范围之广,频率之高。可以说,《诗经》在士大夫及知识分子中间得到普及。难怪孔子对他的儿子孔鲤说:“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。”^② 不过当时的诗和歌在形式上有明显的区别,尽管它们都是诗文化的精神方式。

古代用诗之风的形成,与当时周天子对《诗经》的地位及其态度有很大关系。《国语·周语》说:

故天子听政,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,瞽献曲,史献书,师箴,瞽赋,矇诵,百工谏,庶人传语,近臣尽规,亲戚补

^① 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观周乐于鲁,因为使乐工歌诗未见具体篇章,故未计算在内。

^② 《论语·季氏》。

察，瞽、史教诲，耆、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。是以事行而不悖。

在诗为政服务的前提下，周代还设有专门编诗、授诗的人，这就是太师。当时有两类学校：一类是单为“国子”^①设立的学校，教以“乐德”、“乐语”、“乐舞”、“六艺”、“六仪”等。这“乐语”就是教给国子如何理解诗，如何用诗。另一类学校是专为乐工们设立的职业技术学校，主要是教乐工们如何歌诗、诵诗、演奏诗和舞诗。乐工们的老师是太师，太师中的德才兼备者被选拔去教国子^②。《礼记·王制》说：

天子五年一巡守，岁二月东巡守，……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。

《汉书·食货志》也说：

孟春之月，群居者将散，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，献之太师，比其音律，以闻于天子。

① 即贵族子弟。

② 《周礼》中规定有乐师、太师之分，到春秋战国时代可能合二而一，通称为“师”了。因为《论语》和《左传》只提太师和师，不提乐师。《荀子·王制》也只云：“修宪命，审诗商，禁淫声，以时顺修，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，太师之事也。”

如果这些记载不错的话,那么太师除了教诗之外,还有收集整理诗的任务。其实,《周礼·大师》说太师“教六诗”,没有说另外还有什么人编选诗。可见编选诗这种工作也是太师的。荀子说的“修宪命,审诗商,禁淫声”,似乎也是从这方面说的。既然教诗,拿什么去教?只有利用编选的诗作课本。所以太师承担着编选诗的工作是不错的,这种工作也是非他们莫属。所以荀子才说这些工作是“太师之事也”。

孔子之前研究《诗经》的人应该说是很多的,除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太师外,还有那些传唱诗的人。这些人,虽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和身份,却知道人数不少。从记载周人历史的《大雅·生民》和《公刘》,以及记载商人历史的《玄鸟》、《长发》的产生,到《诗经》编选终止,有一个很长的历史空间,其中有的人创作诗歌,有的人传唱诗歌,有的人筛选、教授诗歌。这些传唱者也应看作是对诗进行研究的人。这些无名氏和太师都是在《诗经》的产生阶段先于孔子研究《诗经》的人,也是最早研究《诗经》的人。

(二)

我们今天寻求最早对《诗经》中的诗进行研究的人,条件不能太苛刻,更不能拿今天研究者的标准去衡量。最早的研究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。因为在《诗经》产生的时代,还没有专门的研究家,更不会有人写专著,但是对其中某一首诗表现

出一定的态度,就应该看成是一种研究了。当诗作者第一次歌唱自己的作品后,喜爱者便立即传唱。从接受美学的视角看,这第一位传唱者便是第一位研究者和再创造者。正是这些最初的业余歌手,才使出现在民间的诗作得以流传。主动传唱别人的作品,这实际上就是表示了对该作品的选择和喜爱。这种态度就是一种较原始的评论,也是研究了。在未有文字之前,先民们口头创作的诗歌,有些流传下来,有些没有流传下来,主要因素取决于传唱者的多少,《商颂》中的《长发》,《大雅》中的《生民》、《公刘》,这是《诗经》中产生时间比较早的诗歌^①。有人说这些都是祭歌,但从诗的内容看,这是述说商民族和周民族历史的诗歌。这些诗的创作不是为了祈祷,而是为了团结本部族,激发民族自豪感。有时可能还用于祭祀祖先。这些诗歌是当时商、周部族的族歌。它一经创作出来,便得到了本部族成员的喜爱,所以一直传唱了这许多年,直到被编进《诗》中。它们的流传有似于《苗族古歌》和《格萨尔王传》等苗藏民族的史诗。

到了《诗经》的时代,虽然已经使用了文字,但只是在上层社会,只有王朝士大夫即席赋诗才有专人记下。而在民间,还是依靠口耳相传。这些传唱者也是加工者。他们根据自己的看法或体验,或从用词上,或从音律上,进行必要的修改。民间这些诗歌^②,在被“采诗官”采走之前,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

① 其中可能《生民》最早。

② 作者当然不只是些下层人,也有贵族士大夫们。

传唱、修改。收集者只能从曲调和收集地区粗略地知道这是某一地区的诗歌,但谁是该诗的第一作者,却是无法查找,也没有人去查找。诗歌到了收集者之手,已是经过了多人之口。这“多人”,既是演员,又是诗歌的修改者,也是研究者。不仅是民间创作的诗歌,就是出现较早的《生民》等诗歌,在传唱中,也在不断加工修改,一直到有文字记录下来为止。不过这种修改加工基本上还保持了初作时的原貌。人们公认为述说周民族历史的《生民》、《公刘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緜》、《皇矣》五首诗,只有《生民》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形态的神话,可以说明其产生是较早的,最迟在灭商之前,很可能是在公刘时代。公刘带领本部族迁徙,创作出这首诗歌,鼓励本部族成员团结一致,再接再厉,以便完成这关系周部族生死存亡的大迁徙。这样一首古老的诗歌能够流传下来,是因为得到历代周人的承认和喜爱才得以实现。这也是一种评价,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对《诗经》中的诗歌的研究。优胜劣汰,能够流传下来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周文王之前的诗歌肯定不少,但仅流传下《生民》和《公刘》两首,这与周人对这两首诗的认识有关。同样,西周到春秋中叶,人们创作的诗歌也一定不少,但仅有三百多首得以保存下来,这与编选者有关,但在入编之前,能不能广泛流传,从而被采入也有很大关系。越是流传时间长而被采入的诗,在流传者眼里肯定认为是好诗。其余因不愿传唱,创作出来不久,大约便被淘汰了。当然也有好诗,虽在人们口头流传,但被采编者因某种原因遗漏也是有的。

这些诗歌的传唱者,是最早对《诗经》进行研究的人,但不

是用文章,而是用传唱这种较原始的表达方式。我们今天能够欣赏到《诗经》中这些诗作,与这些最早的研究者有很大关系。

(三)

《雅》诗多出自朝臣贵族,容易记录,而出自民间的即兴之作能够流传,当然有传唱者的功劳,但集中到诸侯、天子宫中,则必须有人去收集。在那交通十分不便,书写又特别困难的年代,如果没有专人去收集,也不会长久流传下来。原始神话的佚失,恐怕就是长期流传于民间,缺乏专人收集整理,最后湮没无闻了。《诗经》中的诗所以至今尚存,与专门收集者有很大关系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:

故古有采诗之官,王者所以观风俗,知得失,自考正也。

何休在《春秋公羊传·宣公十五年解诂》中则进一步说:

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,官衣食之,使之民间求诗。乡移于邑,邑移于国,国以闻于天子。

这可能是东汉人根据西汉乐府的设立而推断周代也有这样的